

报告与书评



2018 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

朱昊贊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 2018 年符号学相关论文、著作和学术会议情况，展现本年度中国符号学的发展状况。这一年，我国符号学研究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传播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生态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等相关领域推进。整体来看，理论探索、应用融合成为本年度符号学的发展进路：传统的符号学概念通过新方法、新思路的引入获得新的阐释；反过来，符号学的“意义”属性使其为人工智能、生态环境等前沿性话题提供独特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符号学，发展进程，年度报告

2018 Annual Report of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Zhu Haoyun

Abstracts: By analysing semiotics papers, works and academic conference reports,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miotics in 2018. This year, Chinese semiotics studies have been remarkably furthered in the areas of Marxist semiotics,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semiotics, eosemiotics and art semiotics. This year, the trajectory of semiotic development has include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ntegrative application. New interpretations have been achieved through

□ 符号与传媒（18）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ethods and ideas alo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semiotics. Meanwhile, meaning, as the very nature of semiotics, has provided a uniqu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dealing with cutting-edge topic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sues.

Keywords: semiotics,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DOI: 10.13760/b.cnki.sam.201901017

2018 年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稳步推进的态势，其理论深度不断深化，应用广度继续拓宽。本年度符号学研究进展的具体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继续交融；传播符号学对媒介、新闻等话题的研究较为深入；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在讨论中进一步明确；新技术条件下技术符号学、生态符号学等前沿话题的研究取得初步突破。本文通过盘点本年度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以及举办的学术活动，尝试对 2018 年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

一、2018 年我国符号学发展概观

（一）论文发表情况

本年度在“中国知网”上以“符号”为主题且全文包含“符号学”的文献共计 1225 篇。以“中国知网”学科分类来看，“新闻传播”主题类文章数量由 2017 年的 88 篇增长为本年度的 115 篇，占比最大，该主题成为学界当下最为强势的研究热点。而“美术”“语言”“影视”“文学”主题下的文章数量几乎与上年度持平，继续维系着传统话题的可探讨性。除此之外，“建筑科学”“城乡规划与市政”“哲学”“市场经济”和“商业经济”等话题开始受到关注，符号学理论在地理、经济、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学术活动情况

2018 年是符号学学术活动异彩纷呈、成果丰硕的一年。在主题方面，符号学学术活动与传播、语言、文艺、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更为密切；在形式方面，学术活动规模扩大化、频次常态化、影响深远化的态势已然形成。

本年度符号学学术活动继续在文化领域进发。其成果主要以 6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与文化符号学国际符号

学研讨会”为代表。该研讨会由南开大学文学院、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上海《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外的百余位知名学者就“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文化符号学的互鉴与互渗”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其会议成果对加速我国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受现实媒介环境的驱动，传播符号学的研究继续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中国新闻史学会符号传播学研究委员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研究委员会等学术团体的关注与支持下，“首届符号传播学研讨会暨 2018 年符号学高层论坛”于 7 月 9 日至 10 日在四川大学举办。参会的 180 余位学者就“传播学研究的反思与超越”“传播学研究的符号学路径”“传播学与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符号学方法在当今文化中的应用”和“符号学发展的新面向”等传媒热点话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会议涉猎话题之丰富、探讨角度之新颖，是对学者有关符号学研究饱满热情的展示，同时也是对传播学与符号学在本体论、方法论等方面蓬勃发展趋势的具体印证。

语言学是现代符号学的发源之一，尤其是在语言形态逐渐分化的当下，该话题在研究价值上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彰显。10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理论语言学前沿及其协作应用高层论坛”，10 月 19 日至 21 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等，通过对符号学理论、跨学科符号学、社会符号学、认知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符号与传媒、符号学与社会实践等当下热点问题的思考，展示着符号学与语言学在新媒介时代下融合发展的现状。

12 月 28 日至 30 日，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构建与前沿问题”为主题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论坛”在武汉大学召开。参加论坛的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语言学界、符号学界、传媒学界等多角度切入，对符号世界承载着的人类生存意义、人类自由发展程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该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本年度符号学领域大型学术会议的完美收官。

除此之外，本年度符号学在科研领域取得的两项进展也值得大家的关注。其一，4 月 21 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分支机构“符号传播学研究委员会”成立。该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符号学研究获得学术机构层面的正式认可，体现着学界对我国符号传播学的科研水平的提升、对促进中外传播学界交流所怀抱的巨大期待。其二，11 月，符号学相关课题（“巴蜀图语”符号谱系整理分析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首获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重大研究专项立项。该项目的通过，对保护中华传统文字和文化对象、打破西方字母文字为基础的学术桎梏、树立符合中国符号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是极大的推动。由

□ 符号与传媒（18）

由此可见，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实现着从“冷门”绝学到“热门”显学的跨越式发展。

（三）专著出版情况

专著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思考成果的具体展示，具有显著的系统性、解释性等特征。依据专著的出版数量，可以判断出该学科的理论发展水平和体系架构的发展程度。2018年与符号学密切相关的专著和译著，共计有27部左右^①。在这27部专著中，虽然对符号学基本概念的探讨与往年相比数量减少，但是其聚焦问题却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端点强势拓宽。

其一，引进最新的理论成果，加速符号学理论框架的文化性、纵深度。如：怀宇翻译的《显义与晦义》（再版，2018）、傅志强翻译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2018）通过引入国外名家的著作，对符号学逻辑层面和框架建设进行完善。朱永明和胡天璇合著的《中华图像文化史：文字图像卷》（2018）、段炼所著的《从艺术史到当代艺术的符号学研究》（2018）则是从历时性的角度探究符号学脉络。魏全凤翻译的《宗教的文化符号学》（2018）和宗争编著的《民族符号学论文集》（2018）则是从民族、宗教角度对符号问题进行理论关注与探讨。除此之外，叶舒宪所编著的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中不乏符号学作品，如再版的《文化与符号经济》（2018）、《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2018）、《文化与符号经济》（2018）、《符号、语言与艺术》（2018）等，均从文化、经济角度分析了社会生活的结构与变迁，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对符号学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校验。

其二，走出学科范畴拘囿，强化对现实问题的指导实践。如汪海波所著的《品牌符号学》、魏全凤等人翻译的《应用符号学》（2018）和凌逾所著的《跨界网》（2018）关注现当代环境中的传媒现象。崔君衍翻译的《电影表意泛论》（2018）、胡一伟所著《戏剧：演出的符号叙述学》（2018）、张素琴与刘建合著《舞蹈身体语言学》（2018）等聚焦于对影视作品的文本分析。董琳所著的《宗教文化的空间符号表征与实践》（2018）、唐霖所著的《批判与解构：孟菲斯设计思想研究》（2018）、郑震所著的《中国都市中的消费实践：符号化及其根源》（2018）等则关注对空间地理环境的探讨。潘琳琳的《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红高粱〉文本阐释》（2018）和许双如的《华裔美国文学

^① 由于时间和资料限制，本文提及专著及译著统计时间段划定为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仅包括中国大陆的符号学研究成果，未覆盖港、澳、台地区。特此说明。

“身份表演”书写研究》(2018) 等著作则侧重于对文学作品的深入分析。

二、2018年我国符号学理论研究

2018年,我国符号学理论研究推陈出新,成果丰硕,不仅关注于抽象理论的宏观指导,同时兼顾微观概念的差别探讨。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传播符号学的研究版图强势扩展,符号学理论概念得到进一步厘清与完善。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势头仍旧强劲,符号与文化、经济的内在逻辑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在著作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2018)一书提及语言符号学转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貌的影响,并做出判断:只有充分考虑符号学、语言学在文艺理论中的巨大作用,才可以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科学性发挥到极致。叶舒宪编著的《文化与符号经济》(2018)、《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2018)和《符号、语言与艺术》(2018)则是以文化为中介,通过分析经济文化资源转变为生产力的具体过程,揭示当代社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脉络。

在论文方面,各大期刊年内共发表30余篇论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的文章,另有《文学评论》《符号与传媒》等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等研究专辑。有的学者以介绍和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美学(傅其林,2018)、消费(陈文斌,2018;葛在波,2018;黄兆琼,2018)、文化(杨建刚,2018)等方面的论述为核心,不断加固国内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理论基石。有的学者则是批判性地分析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的具体形态(匡存玖,2018a;2018b)。在著作方面,傅其林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2018)一书中提及语言符号学转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貌的影响。

在引入马克思主义符号思想的同时,国内仍有大量学者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符号思想剖析。比如,苏智在《〈周易〉的符号学研究》(2018)一书中,结合西方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力图通过对《周易》经传符号体系的分析,解读出《周易》卦爻系统中的符号思维逻辑。祝东与曹慧敏则立足国内的传统文化,将中国传统的道家理性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精神作对比,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2018)。李卫华则从中西理论的双向阐发、理论与文本双向互动的策略角度,在方法论层面为中国古典文学符号学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2018)。

另有学者对儒家礼学、道家法学、墨家和名家的名辩学思想(祝东,

□ 符号与传媒（18）

2018a; 2018b; 2018c; 2018d) 所包含的符号学意义进行提炼概括,以此阐发中国符号学遗产,加速中外学术思想的交流对话。朱永明、胡天璇合编的《中华图像文化史(文字图像卷)》(2018)从符号语言学视角出发,以产生、构成与传播三大场域为语境逐层展开,为展示汉字文化史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更为立体与全面的观察视角。因此,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研究成果的出现,对于促进中西方特色的交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理论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传播符号学研究成为符号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在本年度更是有多篇在业界引起广泛探讨的论文成果问世。“传播”“媒介”作为传播符号学的关键词,在本年度讨论仍旧热烈。

凌逾所著的《跨界网》(2018)聚焦于当下跨学科的后现代语境,通过对符号学、叙述学、媒介学等理论的运用,分析了文学与艺术的融合之道。张骋通过比较符号学视角下“传媒”“媒介”“媒体”概念之异,对“传媒艺术”这一命名成果的意动性和接触性做出了肯定(2018)。李敬从“信息意义”和“社会互动”两大环节切入,通过媒介技术、信息意义与对象三个层面探寻福柯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交集(2018)。蒋晓丽与贾瑞琪从元语言体系、任意性和理据性层面对后传播时代下的语义场进行了分析(2018a)。以上成果,对于指导网络传播、调动游戏化传播思维方式具有启发意义。

除了对传播符号学常规性问题的探讨之外,对新闻游戏现象的讨论也成为本年度研究的亮点之一。蒋晓丽与贾瑞琪首先从符号叙述学的角度,以“纪实—虚构”与“时效—非时效”作为维度划分依据,对新闻游戏类型进行了划分(2018b),并从叙事性的属性与程度两方面出发,对当前新闻游戏叙事属性存在与否、程度深浅问题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与回应(2018c)。之后,有学者则延续叙述学的思路,从新闻报道的符号化和再媒介化角度对受众的自主选择权在新闻游戏中受到挑战的问题进行反思(李俊欣,2018)。在新闻媒介技术革新的当下,有学者关注到了新闻真实性的判断标准问题,沿符号学路径对比“范”与“失范”的成立条件,得出对异项的二度追求会导致“新闻失范”的价值判断(饶广祥,李巾豪,2018)。

在符号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本年度的著作着重对结构主义、逻辑关系等概念问题进行辨析与探讨。陈素艳、张秀蕊合译的《符号逻辑:语法、语义和证明》(2018),从符号逻辑学角度出发判别了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使用规范,得出前者具有可判定性而后者不具有可判定性的结论。这对提出、判明和验证符号逻辑具有指导价值。傅志强所译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2018)，以介绍结构主义领域内的名家名篇的方式，阐释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概念，以此明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形成历史，对于把握符号学起源脉络具有指导意义。

在理论成果方面，本年度论文则侧重于对符号学基础概念的辨析或二度阐发。赵毅衡回归到符号学“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的基础问题，确立了符号先于意义在场的立论，从而实现对意义世界的分析判断(2018b)。面对符号真知问题，赵毅衡通过梳理目的论的发展脉络，实现着对皮尔斯“真知目的论”与维纳“反馈目的论”互补性观点的强调(2018d)；王新朋和王永祥则从哲学符号学视域出发，以认知差为动力，推动着文本间性与文本内横向真知的实现(2018)。面对“神话”与“象征”两个关键词，唐小林和程天悦从罗兰·巴尔特的神话理论出发，得出“只有将神话神话化，才能解构神话”的结论(2018)；康澄则通过应用尤里·洛特曼及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对象征理论的论述，成功促使象征的文化意义生成，文化记忆机制成了文化符号学象征论的核心观点(2018)。

在本年度符号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中，“修辞”“情感”和“风格”概念比往年出现频率高，研究的深入程度也较往年更甚。赵毅衡首先对“风格”“文体”“情感”“修辞”等关键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赵毅衡，陆正兰，2018)，并维护正验证巴尔特《写作的零度》从冷感情、无风格、零修辞三个环节对其概念的定义(赵毅衡，2018c)。

谭光辉就“修辞”“情感”和“风格”的定义有着新的见解，他认为情感是文本的内容性附加因素，风格是文本的形式性附加因素，修辞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对常规表意习惯进行突破的技巧(谭光辉，何倩，王嘉燊，2018)。赵星植和彭佳则从皮尔斯三分法切入，解释情感(作为第一性的表情解释项)、风格(作为第二性的能量解释项)、修辞(作为第三性的逻辑解释项)三者的关系(赵星植，彭佳，2018)，并肯定了皮尔斯建构的普遍修辞学体系所具有的深远现实意义(赵星植，2018)。几位学者的精彩辩论，对探究情感、风格、修辞分别如何在文本中存在、如何在文本中发挥作用的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在读者面对具体的符号修辞问题之时，这些理论成果便可为其提供更为准确的阐释路径。

三、2018年我国符号学应用研究

传统的古典文化与当下的现代文明的冲突碰撞、科学技术操作实践与文学艺术创意展现的迥然不同、个体发展与环境变化的密切关联……所有的这

□ 符号与传媒（18）

些都是符号世界的观照。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公分母，借助其学科优势进行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未曾不妥。因此，本年度符号学应用研究亦继续围绕具体的实践问题展开，以描述或解释的方式，对“人—物—意义”的关系问题进行持续关注。

在著作方面，学者首先肯定了符号学理论对实践性话题的指导作用。魏全凤等人合译的《应用符号学》（2018）通过吸纳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的优势，以“编码”“符号”“话语”“行动”“文本”和“文化”六个基本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串联起从最简单的“编码”到最复杂的“文化”的演变路径，对于打开符号学应用角度的视野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汪海波所著的《品牌符号学》（2018），则关注当代社会的符号消费现象，以符号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品牌设计符号意义与外延、符号意义建构与品牌整合传播、品牌符号消费等概念的梳理，揭示出符号与经济文化的密切性。郑震所著《中国都市中的消费实践、符号化及其根源》（2018）则以符号学、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揭示出当代中国城市大众消费的符号化机制，这对于如何引导国内民众的合理消费行为具有参考价值。

在文学艺术方面，学者关注对具体艺术形态表意建构路径的剖析。如，崔君衍翻译的《电影表意泛论》（2018）以电影为研究对象，从现象学、语言学、叙事学、风格学、符号学等角度对“陈述结果”和“精神分析”的电影理论进行了批评审视，给予相关回应。胡一伟所著的《戏剧：演出的符号叙述学》（2018）以戏剧为研究对象，以体裁、媒介、伴随文本、叙述框架等概念为切入点，抽象出戏剧演出意义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张素琴与刘建所著的《舞蹈身体语言学》（2018）以舞蹈为研究对象，从生物学的身体构成、符号学的身体表达、哲学的身体思想和艺术学的身体呈现等方面论述舞蹈身体、语言和审美三者的关系。海维清所著的《有意味的形式：舞蹈符号视角下的中华“圈舞”舞蹈文化遗存研究》（2018）同样以舞蹈为主题，借助符号论、符号学、形态学的相关概念，得出“圈舞”是“人类社会早期生活、情感、信仰乃至社会组织关系的最集中体现”的结论。

在文化宗教方面，学者以提炼符号表征的方式，强调符号价值对文化结构的影响。魏全凤等人合译的《宗教的文化符号学》（2018）通过对符号学已有的相关概念性工具（如符号—文本—文化、符号哲学、文化哲学等）的展示，从文化的角度对宗教的可持续性或不可持续性进行评估。董琳所著的《宗教文化的空间符号表征与实践》（2018）一书，从信仰观念、感性形态、本质特性、实践模式等角度展开，以此对“宗教文化空间”特有的文化符号

和表征系统进行系统的介绍。宗争所著的《民族符号学论文集》(2018)则借用符号学理论,以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对民族符号进行分析,完成对“文化系统—语言模拟系统”构建。

在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中,生物符号学、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等因为顺应社会发展形势而成为研究热点;空间、景观等聚焦于地理环境的研究较为突出;语言、文学、艺术、广告、消费等传统话题的研究仍继续进行。

在人与生物、人与机器关系层面,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群体的前提下,有的学者利用皮尔斯符号学的相关理念,重新定义生物学的事实、问题与方法,颠覆了生命的机械过程,而是将其视为意义生产和符号传递的过程(周理乾,2018)。有的学者则结合《老子》文本的“道”和“名”问题,通过语言的加入,对由人类构建的主体世界的特异性进行展示(韩蕾,2018)。在对人工智能问题的讨论上,有学者借助皮尔斯的理论,一方面肯定人类思维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则以机器不具备高阶自控能力为依据实现人机分野(陈曦,2018)。有学者则从可能情感的角度否定了人类情感被完全数字化的可能,认为人工智能和情感模拟有可能放大人类理性思考的成分,但绝不可能完全模拟或取代人的意识(谭光辉,2018)。至此,符号学可以凭借自身的学科特征,就人工智能核心问题提供自己的专业判断。

在地理环境层面,生态符号学问题、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日益受到各方关注。有学者从符号消费角度入手,通过剖析符号消费过度化造成的生态困境的具体表现,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些许启示(吉志鹏,朱泽东,2018)。有学者在旅游消费符号景观化的前提下,对旅游符号开发与生态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李燕,2018)。有学者从旅游者的符号实践入手,在物质、技能、意义和旅游者四个层面上肯定了旅游者符号实践在促进旅游吸引物符号主体化、旅游者因素客体化问题上的重要性(陈岗,2018)。有学者从旅游景观的开发入手,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三个维度讨论空间生产环节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制造和物质生产过程(谭华,郑巧,2018)。

除此之外,本年度有关“空间”“地方”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新颖的观点时有闪现。有学者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通过符号占领实现着城市特定建筑与空间的传播连接(姜海,2018)。有学者则将城市空间中的休闲体育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释放感知、想象和实际、身体运感、象征符号和物性身体几组辩证关系之间的张力,将城市空间“重新身体化”(张震,2018)。

语言、文学、艺术、图像等传统话题方面,研究成果继续推进。在语言

□ 符号与传媒（18）

学方面，翻译符号学的理论不断深入。有学者从符号共相、信息守恒定律和文本信息恒量等角度探讨了符号守恒问题（佟颖，王铭玉，2018）。有学者以皮尔斯符号学三元观为主要理论依托，从翻译符指过程的发生机制、翻译符号学的逻辑推理模型和译域划分三方面建构翻译符号学文本阐释的模式（潘琳琳，2018）。有学者通过对有关皮尔斯“信念”研究的回顾，对翻译符号学的普适性、客观性和绝对性价值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贾洪伟，2018）。

在艺术方面，研究成果体现在对艺术的定义、性质的继续分析，尤其是对“艺术化”概念做出的深入解读。叶舒宪编著的《符号、语言与艺术》（2018）以及段炼所著的《从艺术史到当代艺术的符号学研究》（2018）则从符号学角度分析史前艺术的起源、发展过程与演变规则，以此历时性展示艺术思维的变迁。学者则通过论证“艺术作为出场符号”的不适用性，反向论证艺术作为显现性的“出场符号”的合理性（赵奎英，2018）。另有学者通过比较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优劣，试图将艺术定义更向前推进一步，以揭露出艺术“跳越对象”的调整，从而开拓解释项无限衍义之可能（赵毅衡，2018a）。

在视觉图像方面，互联网中的网络表情符号成为图像符号学研究的新热点。有学者认为，网络表情符号通过“图文双构”的多模态形式、隐喻与互文性等修辞方式，实现了“图像行为共同体”的情感交换与文化抱团（屈济荣，李异平，2018）。有的学者则认为，网络表情符号以身体示现与情感满溢的方式构建了交流场，实现了符号发出者“趣我”形象的建立（饶广祥，魏清露，2018）。除此之外，音乐的视觉转向问题也有论及，有学者从MV、多媒介、音乐节的角度，系统诠释了音乐由听觉符号编码转向多媒介符号编码的转变过程（陆正兰，魏云洁，2018）。

结语

纵观2018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状况，可以发现本年度我国符号学研究总体呈现出较强的现实关怀意识。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现阶段符号学发展历程中所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

在基础理论层面，学者们一方面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建构现代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又立足于我国本土现实，挖掘中国符号学自身发展脉络。通过对符号学核心概念的一次次争论，符号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得到了明晰与完善，符号学理论基石不断得到加固与沉淀。因此，在本年度不断的讨论，将经典的符号学理论阐发出了新的含义，研究层次整体提升。

与此同时，新的研究话题不断地被引入符号学范畴，学科边界得到持续

拓展。传播符号学作为近些年重点，其研究对象的选取也更加贴合我国当下的传播环境和媒介生态。本年度符号学研究触角有向人工智能、生态、环境问题延伸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符号学对意义世界的探讨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本身，而是开始对人与科技、环境等周边事物的关系问题进行着整体性探究与思考。这一视域的扩大，对符号学思想系统观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本年度符号学研究虽然整体推进较大，发展速度较快，但当我们面对研究主题发展不均衡、符号学跟风滥用等具体问题时，亦需要保持警惕并积极应对。本文尝试对本年度符号学发展状况进行展示，虽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符号学适用性的再次印证，但无奈于时间精力有限，难免挂一漏万，不足之处敬请学者批评指正，共做商讨。

引用文献：

- 安格勒，大卫（2018）。符号逻辑：语法、语义和证明（陈素艳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 安静（2018）。从“诗教”的艺术符号学阐释看中华美学的生命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39，169—177。
- 巴尔特，罗兰（2018）。显义与晦义（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陈岗（2018）。旅游者符号实践的概念框架及其动态分析。旅游学刊，11，66—74。
- 陈文斌（2018）。重回马克思：反驳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解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6，167—172。
- 陈曦（2018）。皮尔士符号学及其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9，107—111。
- 董琳（2018）。宗教文化的空间符号表征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段炼（2018）。从艺术史到当代艺术的符号学研究。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 冯月季（2018）。认知传播学：学科合法性质疑。编辑之友，7，31—36。
- 傅其林（2018）。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形态及其启示。文学评论，1，30—36。
- 傅其林（2018）。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葛在波（2018）。“商品—符号”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评析。岭南师范学院学报，39，155—160。
- 海维清（2018）。有意味的形式 舞蹈符号视角下的中华“圈舞”舞蹈文化遗存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韩蕾（2018）。论《老子》的人类主体世界建构：一个生物符号学观点。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17。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胡一伟（2018）。戏剧：演出的符号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符号与传媒（18）

- 黄兆琼（2018）。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政治批判的三种路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7，46—54。
- 霍克斯，泰伦斯（2018）。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傅志强，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吉普森，克莱尔（2018）。如何读懂符号：思索触类旁通的标志意义（张文硕，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 吉志鹏，朱泽东（2018）。批判与启示：符号消费的生态困境及绿色发展。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9—115。
- 贾洪伟（2018）。翻译符号学的信念界定问题。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0—65。
- 姜海（2018）。激活空间：城市传播中的动力机制形成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39，149—155。
- 蒋晓丽，贾瑞琪（2018a）。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游戏化及其表征——一种符号学视角。社会科学战线，1，149—156。
- 蒋晓丽，贾瑞琪（2018b）。新闻游戏：一个属性的界定。新闻界，1，42—47。
- 蒋晓丽，贾瑞琪（2018c）。新闻游戏的非虚构叙事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0，70—74，81。
- 康澄（2018）。文化符号学中的“象征”。国外文学，1，1—8，156。
- 匡存玖，傅其林（2018）。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转向。江西社会科学，38，24—31。
- 匡存玖（2018a）。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16。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匡存玖（2018b）。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若干问题。学术论坛，1，16—22。
- 拉森，斯文（2018）。应用符号学（魏全凤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李敬（2018）。传播符号学视角中的福柯——社会互动与讯息意义。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121—129。
- 李俊欣（2018）。符号叙述学视角下的新闻游戏及其伦理反思。新闻界，9，34—40。
- 李卫华（2018）。中国古典文学符号学：研究对象、策略及方法。北方工业大学学报，30，84—91。
- 李燕（2018）。资本逻辑、符号式消费与生态文明。江汉论坛，10，63—69。
- 莱昂内，马西莫（2018）。宗教的文化符号学（魏全凤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林升栋，保罗·范登侯汶，张艺琼（2018）。20世纪初全球广告的中国化：一个符号学研究（英文）。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16。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凌逾（2018）。跨界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陆正兰，魏云洁（2018）。新媒介环境下的音乐视觉转向。中州学刊，10，143—147。
- 马大康（2018）。从符号系统结构探析“文化基因”。社会科学，4，163—172。
- 麦茨，克里斯蒂安（2018）。电影表意泛论（崔君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潘琳琳（2018）。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外国语文，34，119—127。
- 潘琳琳（2018）。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红高粱》文本阐释。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 屈济荣，李异平（2018）。作为“图像行为”的表情包：符号、修辞与话语。编辑之友，10，45—50。
- 饶广祥，李巾豪（2018）。范与失范：新闻真实的异项追求。新闻界，6，18—24。
- 饶广祥，魏清露（2018）。“趣我”与浅平化：网络表情符号的传播与反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61—168，172。
- 苏智（2018）。《周易》的符号学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谭光辉，何倩，王嘉燊（2018）。“情感研究、风格学、修辞学：关于三者的重叠与区分的讨论”综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0，382—386。
- 谭光辉（2018）。情感间性的符号学研究。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16。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谭华，郑巧（2018）。空间生产视角下地方民俗文化的移植与传播——以恩施土家女儿城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71—75。
- 唐霖（2018）。批判与解构：孟菲斯设计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 唐小林，程天悦（2018）。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的炼金术——重审符号学家巴尔特的神话理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110—117。
- 佟颖，王铭玉（2018）。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的符号守恒。山东外语教学，39，99—110。
- 汪海波（2018）。品牌符号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进（2018）。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新朋，王永祥（2018）。哲学符号学视域下的认知差和真知。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4—59。
- 吴惠凡（2018）。表意与叙事：城市文化传播的符号学解读。当代传播，3，31—34。
- 许双如（2018）。华裔美国文学“身份表演”书写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杨建刚（2018）。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张力及其超越——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学习与探索，9，138—145。
- 叶舒宪，章米力，柳倩月（2018）。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叶舒宪（2018）。文化与符号经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俞建章，叶舒宪（2018）。符号、语言与艺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骋（2018）。符号学视角论“传媒艺术”的命名——兼辨“传媒/媒介/媒体艺术”之异。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0，108—112，132。
- 张静（2018）。欢愉的身体：罗兰·巴特后十年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张素琴，刘建（2018）。舞蹈身体语言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震（2018）。休闲体育对城市空间异化的内在超越——基于列斐伏尔空间哲学的探赜。成都体育学院学报，5，54—59。

□ 符号与传媒（18）

- 赵奎英（2018）。试论艺术作为出场符号。文学评论，4，188—196。
- 赵星植，彭佳（2018）。论风格与情感、修辞之关系：一个皮尔斯解释项三分路径。学术界，1，105—112，286。
- 赵星植（2018）。探究与修辞：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修辞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39，166—172。
- 赵毅衡，陆正兰（2018）。风格、文体、情感、修辞：用符号学解开几个纠缠。学术界，1，87—95，285。
- 赵毅衡（2018a）。从符号学定义艺术：重返功能主义。当代文坛，1，4—16。
- 赵毅衡（2018b）。符号学第一悖论：解释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7，1—5，11。
- 赵毅衡（2018c）。冷感情？无风格？零修辞？——关于巴尔特“零度写作”的符号学论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39，140—144，142。
- 赵毅衡（2018d）。皮尔斯“真知目的论”与维纳“反馈目的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45—153。
- 郑震（2018）。中国都市中的消费实践：符号化及其根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理乾（2018）。生物符号学作为生物学的另一种范式——生物符号学史的理性建构（英文）。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17。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朱永明，胡天璇（2018）。中华图像文化史：文字图像卷。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
- 祝东，曹慧敏（2018）。道家语言观的理性精神：道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思想的比较。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17。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祝东（2018a）。从形名学到符号学：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北方工业大学学报，30，92—98。
- 祝东（2018b）。名与礼：儒家符号思想及其深层意识形态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6，151—157。
- 祝东（2018c）。文质论：中国文学批评的伦理符号学向度。兰州学刊，11，40—49。
- 祝东（2018d）。先秦社会秩序的符号建构——以道家的自然观及其实践为考察对象。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39，153—159。
- 宗争（2018）。民族符号学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朱昊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Author:

Zhu Haoyun, Ph. 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Literata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research field is Marxist semiotics.

E-mail:647278257@qq.com